中国式“城愁”:形成及其纾解

胡小武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中国城乡人口迁移产生了典型的移民社会故乡情结式的原生态乡愁。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带来的城市内部社会结构的变迁,城市居民因城市改造、拆迁而搬离家园,形成了城市内部移民。搬迁居民的空间迁移造成了居住环境、邻里关系、生活方式的变迁,产生了中国式“城愁”。“城愁”是城市空间再生产所导致的原住地居民的社会关系变迁及其社会心理的变化,同样需要被审慎认知和纾解。

[关键词] 城市现代化; 社会结构变迁; 空间再生产; 城愁
[基金项目] 2013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空间落点及其形态研究》(13CSH089)
[作者简介] 胡小武(1976—),男,江西新余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发展战略、城市生活方式、城市问题与治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 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071(2016)04-0178-06　[收稿日期] 2016-01-05

余光中的《乡愁》,道出了无尽的、沉甸甸的游子对家园的思念情愫。家园思念不仅包含游子“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故土情愫和乡土中国“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农耕型村落社会历史记忆,更有对“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睦邻生活怀念。在中国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城乡社会结构巨变与村落的消逝,产生了集体意义上的“乡愁”情结。乡愁的生成是“由于一种外置视角使然,是离开之后的反观,也是一种精神的流连。生于乡土、终老于乡土的乡下人是无法生成乡愁体验的,它却是离乡游子恒定的情怀”[1](P54)。伴随中国当前农村的空心化、衰败和消逝,乡愁情绪必然更将浓烈。然而,中国不仅有乡愁,也有“城愁”。特别是在雾霾盛行、交通拥堵、异质性加强的现代城市,历经城市变迁的居民,同样表达了浓烈的“思城之愁绪”。

一、“城愁”是什么:城市原住民的居住生活记忆与怀旧

从“乡愁”到“城愁”,体现了社会迁移的时空变换及其主体变更。“乡愁”是一个泛指意义上的离乡情怀。这里的“乡”,是故乡,而非乡村。只因“乡愁文学”的形成及其时空背景的描绘,乡愁被长期定格于中国“乡土性”[2](P4—7)的社会底色,导致“乡愁”的主体文化意象被约定俗成地狭义化为“乡土社会原乡性的乡愁”。但是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大规模发展,绝大多数城市都发生了物理空间上的巨变,大量的城市家园被拆毁,众多的城市居民迁移到他处,从而引发了越来越强烈的对城市原住家园生活的怀旧与感伤性的“城愁”。“城愁”,即城市原住民的乡愁,是因城市现代化更新,经历了家园拆迁、街区消逝而移居异处的城市原住民对原有生活社区、街区、大院等“原住地”及其生活方式的记忆、留恋、怀旧、感伤和回味。中国很多城市历史悠久,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城市居民。城市家园便是城市居民的“原乡”。王光明较早发现了都市文学中的“城愁”文化,他从香港诗歌文化的空间意象变迁,提出了“望乡”的“乡愁”到“望城”的“城愁”演化路径,认为进入 1980 年代以后,香港诗歌界逐渐扬弃了故国与乡土的原乡观念,而聚焦于长期安身立命的城市背景以表达各种情怀[3](P113)。岳永逸从一批慨叹、追思已逝繁华市井生活的《东京梦华录》、《秋虫六忆》、《燕京乡土记》、《城门开》等依托“故城”的乡愁文学作品中提出了“城愁”诗歌概念。他认为“这类对一去不复返、不可复制的消散之城——故城——的追忆,便可以称之为‘城愁’。”[4](P14)周蜀秦则从城市规划中的“造城运动”的精神缺失、“建设性破坏”的城市记忆弥散、“街道的死亡”等角度,提出了城市哀愁感,他认为最典型的后果是导致“儿时嬉闹的庭院,邻里间的温情或争吵也随着机器的轰鸣声而消散了”[5](P4—6)。这种反思性的城市批判与“罗哲文之叹”[6](P5)等一样,均属于“城市哀叹”型的感伤性“城愁”。可见,形形色色的“城愁”概念的存在,本身便说明“城愁”已实实在在存在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于城市社会结构加速变迁的时期。

“城愁”主要表现一种城市原住民因搬离和迁居所形成的居住生活记忆与怀旧。怀旧作为一种历史进程中的人类记忆行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心理现象。现代社会的怀旧风，似乎越发成为潮流，消费怀旧、旅游怀旧、空间怀旧、文学怀旧等，不一而足。“怀旧是现代人的一种文化思乡病，处于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在由时尚所引领的文化风潮面前，普遍感受到历史感的缺失，在稍纵即逝的当下现实面前，人们感到人生的不确定性，常会产生焦虑感或某种情感空白，对过去时光的怀旧性想象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们的这种情感匮乏。”[7](P499) 旧物、故人、老家和逝去的岁月等都是怀旧最通常的对象。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怀旧的未来》一书中将怀旧行为分成两大类：修复型怀旧和反思型怀旧。修复性怀旧主要聚焦在“旧”，总是试图恢复旧有的物、观念或习惯等。而反思性怀旧，则关注于“怀”。形象地讲，更像一个人在废墟上徘徊，试图在脑海里重构以往逝去的时光，再现旧物、人、观念或习惯的形象[8](P46)。一般而言，城市化社会结构变迁越快，城市更新规模越大，城市人口越多，节奏越快，往往怀旧情结越浓厚。上海文人余之认为“怀旧是一种乡愁。一种浓浓的、无法排解的恋乡情结，它又浸染着文化的韵味。在入夜的咖啡馆里，在幽幽的灯影下，烟雾萦绕，烛光摇曳，和朋友一起回忆儿时的生活，无疑是一天最为快活的时光。”[9](P86) 上海也的确已成为了一座典型的具有怀旧情愫的超级大都会。

二、“城愁”何以形成：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社会后果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之后，因城市建设和扩张而导致的规模性拆迁、更新及居民搬离，城市原住民成为怀有“乡愁”情愫的重要群体，以及典型的“城愁”文化主体。根据环境心理学的观点，广义的家还包括长期居住的邻里、社区及其周围环境。“当居民被迫搬家时，这种依恋情结尤为明显，包括对邻里社会联系的依恋、对熟悉环境的依恋、对物品的依恋”[10](P344)。很多城市与城镇由于未注重对自然生态、历史记忆和文脉的保存，使得老居民更加形成了对于“故园”、“故街”、“故邻”、“故事”的怀念、留恋甚至感伤。

(一)“城愁”因城市空间环境变迁导致的集体性怀旧

“城愁”是城市现代化的社会后果。城市居民的同城范围的大量迁移，是中国城市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典型过程。张鸿雁认为“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是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过程。城市化的过程首先体现在城市规模扩大和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11](P112) 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并非像美国式的“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12](P4) 的顺序那样依次发生。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增长型的城市化与更新型的城市现代化几乎是同一过程，郊区化扩张、蔓延与城市内部的更新重建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只不过城市内部空间的更新、改造、重建的速度会慢一些，规模上也以街区型区域为主依次推进。在以往的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不论是房地产开发市场化模式，或是政府公共项目的建设开发 PPP 模式或 BOT 模式，都加速了城市更新、扩张与增长的速度。

在这一机制下，大片城市老旧社区被推倒，建设成新的商业中心、高尚住宅区以及休闲广场等绅士化(gentrification)空间。经由绅士化空间改造之后，原先的空间被高档、新的建筑物所取代，新的空间主要由中产阶层所占据，结果是“时尚空间、高消费群体和光鲜亮丽的建筑形态最终取代了贫穷落后的老旧街区”[13](P437—457)。这种老城区改造和更新推动了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城市空间变迁的确异常迅速。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要求，仍将有 1 亿居住在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居民需要加快搬迁。城市原住民的搬离与迁移，仍将持续大规模发生。在过去的 20 年内，几乎所有中国的城市都进行了城市内部的更新与重建，而且不少城市几乎是经历了整体性的老城区重建。1978 年之前出生的城市原住民，有一半以上都经历了老住宅征收、拆迁和搬离的过程，最终形成了脱离原住地并迁移到了同城范围内的其他社区。以南京为例，在经历从 1980 年代以来的南京城市现代化发展阶段之后，城墙内的老旧街区居民超过 98% 以上都搬离了最初的出生地街区，目前仅剩下零星的老旧建筑或街区还有超过 40 年以上居住时长的“原住民”。

可见，伴随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同步发展，老城区、城中村一一被拆迁、改造，城市经历着时空层面的环境变迁、生态变化、历史空间的改变。关于曾经城市生活的集体记忆，从怀旧心理的角度理解，便会形成关于“旧时城市生活”的怀旧与乡愁心理。

(二)“城愁”因同城迁移催生的原住民家园空间怀旧

中国城市化的历史，就是一部拆迁史，也是一部城市改造史。城市改造和拆迁，推动了城市内部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其中后果之一便是城市居民都经历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了从原住社区搬迁到新社区的居住空间位移。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城市老城区的更新较早，规模更大，不可避免出现了大量的老城区居民的街区拆迁与住房搬迁。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成都、西安、天津、武汉、苏州等历史上就较大的城市，进入城市现代化建设阶段，老城区更新以“棚户区改造”、“旧城改造”和“城中村改造”等项目形式大量拆迁老旧居民区，并普遍实行同城异地迁居。自1990年代以来，大多数城市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基本采取了“彻底搬迁，分散安置”[14](P63)模式。因此，伴随着老旧街区的绅士化改造，原来居住于老旧街区的居民一般被集中转移于城市外围区域的大型居民安置社区或保障房社区。其中一些有条件的居民则选择自主买房，落户于其他更好一些的商品房楼盘。

因此，城市居民的同城迁移，离开原住地或原住地社区的消逝，更加具有典型性。比如大量文章都写道，上海的田子坊、新天地石库门等是老上海人最怀旧的地方，现如今，“这里的左邻右舍早已人去楼空，只留下石库门的空壳，供游人观赏。曾经的群居生活，曾经的相濡以沫，早已成为历史。邻里们随着城市的拆迁，都已散开去了。有的搬到崭新的小区，有的远离城区，却很少聚在一起，随之而来的是老邻居被新邻居取代。——至于新邻居，可能老死都不相往来”[15](P85)。在上海浦西老城区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拆迁、改造、更新之后，大量老居民的怀旧情愫，每每诉诸媒体，呈现都市怀旧感伤的一面。而老北京的拆迁改造，更激荡了北京人的集体“城愁”。王军的《城记》、艺术家况晗的画作《拆不掉的胡同——抹不去的记忆》等作品，都集中记录了北京城市拆迁之后的怀旧情绪。还有网络上的老照片热和怀旧潮，现实生活中旅行式的体验和记录，从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人们对历史老街、古建筑原有风貌和韵味的怀念，这是人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去缅怀、记录并且定格历史原貌。2013年北京钟鼓楼地区面临拆迁之前，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消失前最值得一看的地方”。而同时知名艺术家王智远于2013年1月14日发表博文《拍摄于1940年代的北京钟鼓楼照片》，更引发了一股强烈的老北京人的怀旧潮[16]。城市居民的同城范围内的居住空间变迁，家园搬离重置，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和社会化后果。它虽然不似各种城市“游子们”拥有远距离思乡之情，但每每触及关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老街区、里弄、胡同、大院，油然而生的各种“原乡”居住记忆、感怀和心理触摸，当然难以割舍。

（三）“城愁”因空间再生产孕育出的文化型怀旧

城市化最根本的形式就是以空间为要素重组一切社会关系的过程。这种过程以一种新的、陌生的方式将全球和地方、城市和乡村、中心和边缘连接起来。人口迁移最终表现在空间上的位置变化。从农村到城市，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城市的一个地方移居到另一地方，从而完全顺应了城市空间重组人类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列斐伏尔借助于“空间实践”、“空间的再现”、“再现的空间”等概念界说了城市空间的三维属性，即物质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空间实践”，其实就是我们日常可见的物质空间，一种客观环境组成的实体空间，如写字楼、商场、电影院、住宅、广场、酒店等一切人造空间。在各种物质空间基础上，从开始的规划、建设以及之后的空间上的占有及其消费，必然发生人际互动和社会互动，因而形成了各种社会关系。“空间的再现”，再现的是人们在空间场域中的各种占有关系和交往关系。这其中几乎包括了城市居民的全部生产、生活过程。而“再现的空间”，则是人们在物质空间及其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对空间的各种记忆、想象和艺术呈现。由此，城市空间便成为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精神空间。这种空间生产，“任何情况下，都是场域、时间与精神的互相作用的过程，这就是韵律”[17](P67)。这种因空间生产出的韵律，不管是乡土社会的结构变迁，或是城市社会结构变迁，都将因为人们在空间位移、搬离家园之后的情境中产生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怀旧感。

“城愁”已浓缩为对空间的记忆和想象，是对城市空间生产的精神空间的心理反应。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实施“大拆大建”原则，导致大量的城市老街区、老建筑甚至很多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遗址、遗存遭到拆除。如北京的城墙、胡同、名人故居，南京的民国公馆等，都遭到拆毁。著名文化人士冯骥才《哭老街》[18]，便是典型的“城愁”行为。空间再生产导致的批判性“城愁”，在大城市尤为明显。因为中国城市建设经历过普遍的大拆大建，老的、旧的都几乎推倒重来，城市文脉与城市肌理，在轰轰烈烈的推土机行进中黯然倒下。特别是一些历史文化城市的原住民与文化人士，无法抗拒内心深处对消逝的历史文化家园的焦虑、哀愁以及感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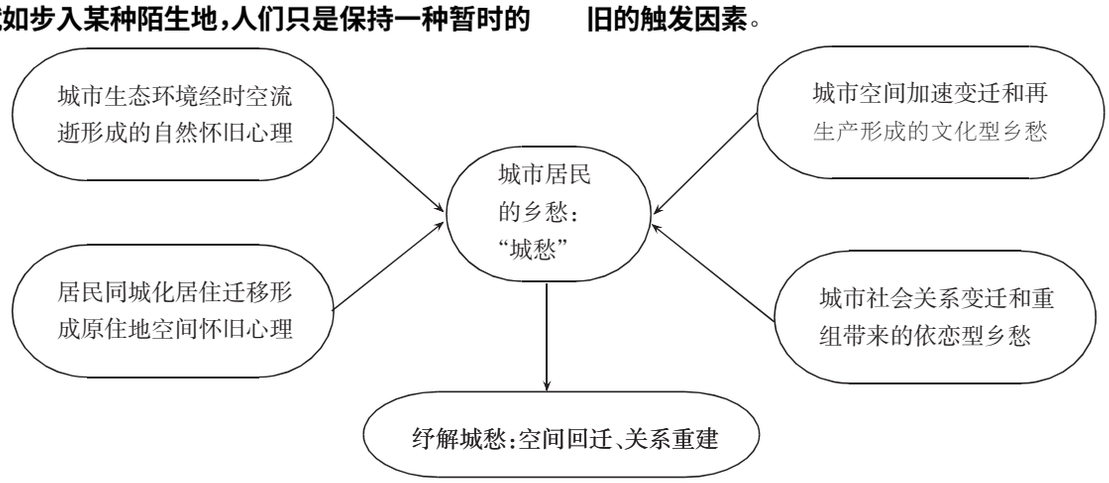
（四）“城愁”因社会关系重构而产生“感伤性反应”

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建构了三重空间的理论框架，更以资本主导的城市空间作为核心研究对象。特别将“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及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及精神属性，作为讨论焦点。他认为“作为民生产品的城市空间不仅是个人遮风避雨的物理空间，而且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是实现家庭组建、后代抚养、生活关照、情感交流和心灵慰籍的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城市空间的公平缺失必然会对人们的生活状况、生活方式、社会心态、价值取向、思想情感、幸福指数等带来负面影响。”[19](P32) 空间建构的个人社会身份、社会阶层和社会心理，自城市化以来便得以确立。富人区、平民区的边界、差异以及符号化，都是典型的空间生产的阶层化社会后果。整体上看，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之前的中国城市住区社会结构与形态，基本上形成的是“单位制社会”和“大院文化”。这种城市住区的形态与中国村落社会的社会生活状态类似，可以看成是一种乡土文化在早期中国城市社会的移植和复制。原来的邻里之间大多彼此都很熟悉，建立了友谊，相互信赖，彼此关心。“从传统社区到现代封闭社区空间的转型，背后隐藏着人际关系的极大改变。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将人们一步步推向文明，而怀旧成为世纪末的流行病和世纪初的新时尚。”[20](P171) 城市居民的乡愁，在这种家园变迁和社区社会关系的变化中不断沉淀浮显。

城市改造拆迁使原本的邻里结构及其氛围遭到破坏和拆散。拆迁安置基本打破了原本因居住关系而结成的各种“社会空间”及其附属关系，如邻里关系、消费方式、休闲方式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老街区、老大院被拆迁，邻里居民大多分散至各个角落的商品楼盘中居住，往往难以重建原来居住地的邻里关系。邻里关系的实质是互助、接纳和融入，一般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形成。而对于老城区住户来说，建立在被动基础上的社会流动和迁徙势必会减少新邻里间发生交往的主动性及成功率。这些因拆迁而迁徙的老居民的整体城市生活形态便走出了滕尼斯所理解的“共同体”而进入了“社会”之中，导致了“人步入社会就如步入某种陌生地，人们只是保持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体生活”[21](P8)。的确，在新楼盘型社区的生活空间中，大家相互陌生，邻里往往互不相识，也无须相识。越大型的城市，这种陌生感的社会生活越发明显，就如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所提出的，“都市人的冷漠，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生活态度”[22](P102—105)。楼上楼下、门对门之间都不再相识，进入了一种新的陌生人社会。由于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天然的大都市的匿名性和异质性社会特征，导致现代人越来越趋于“社会原子化”[23](P291)。在此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淡薄，社会联系松散，相互态度冷漠。而再要重建以往的那种街坊邻里关系，几无可能。对于新的迥异于老街坊型的邻里关系结构，老年居民对搬迁之前的老旧街坊或大院生活的怀念尤为明显。“人们却舍不得长年居住的老房子，更加舍不得老街坊们之间的感情。”[24](P65) 对于老年居民而言，搬离家园之后的新社区生活方式，还包括过去长期连接的医院、理发店、杂货店、公园等社会场域及其社会交往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造成某种不适应，甚至苦恼。城市街坊居民在漫长的生活过程中往往建立了熟悉和亲切的邻里关系与文化，成为不同家庭与亲友之间相互依存的纽带，人们与附近的小卖部、小饭馆和社区活动中心等有着非常密切而稳固的关系，几乎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城市改建和搬迁突然把这些关系都斩断了。“这种社会关系给予人们的支持与安全感，一旦失去时，必然会引起人们心灵上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即使是考虑最周到的社会发展规划也不能完全避免，特别是对老年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们一辈子都是在这个地方生活过来的。”[25](P57) 心灵上的痛苦，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很难完全适应新社区的生活环境、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这种不适应所造成的痛苦也是激发怀旧的触发因素。



图示：城愁的形成及其纾解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三、“城愁”的纾解与应对

城愁与乡愁，都是中国社会结构巨变之后人们对原生态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要记得住乡愁，便要找准具体的目标与路径。2015 年 12 月在中央城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城镇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城市居民能望得见山、看得见水，就是要求城市生态环境恢复到工业化、城市更新与扩张之前的那种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般的美好自然环境。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发展，相较于二三十年前的城市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如今的城市到处是水泥森林、交通拥堵和雾霾压城，城市居民饱受“城市病”的困扰。城市自然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是纾解“城愁”最基础的行动。目前，国家正在推进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生态城市、园林城市、绿色城市等建设理念，便是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为目标的战略规划与行动。与生态环境的青山绿水同等重要的，还有文化上的“根与脉”。城市发展必须要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建筑、街区和文脉，要尽可能地让城市的历史肌理得到延续，做到让“今天新型城镇化的历史实践，都应当成为一种富有个性的文化形象创造和文脉传承的过程”[26](P58)。需要通过规划立法和城市历史遗产保护法的实施，系统推进城市的文化空间与历史街区的保护。只有如此，保留下来的老房子、老街区才能留住城市居民的“城愁”。

“城愁”不仅是对青山绿水的依恋，更是对空间场域和邻里关系的依恋。而要纾解这种“城愁”，还急需给予城市空间更新之后居民日常生活方式更多的选择与人文关怀。一种可能是，改变“彻底搬迁，分散安置”的刚性条件，采取分批分段拆迁，让居民有一个时空改变的心理过渡期，建立起调适不适应症的缓冲机制；或可以改变拆迁搬离的方式，采取一部分或大部分居民原地期房回搬或就近安置的办法，“在‘疑无路’中‘退一步’，它可以调用社会性机制，转变这种被动的局面，达到‘海阔天空’的新境地”[27](P23)。保留原住民或回迁原住民，可以让城市文脉和街区文化气息得以保存，更是对一种原住民空间权利的保护，社会关系的维系，以及邻里关系维护的重要手段。只有原住民留在老城区的空间中，活的城市历史才能得以保留，才能减少这些原住民因搬离而产生的怀念和依恋。从城市文化保护角度出发，“要确保改造后有一定数量原住民的回迁和安置，新旧及多层次居民交融的居住文化方得以共存并延续发扬，这样不仅避免社会阶层的隔离与对立，同时也构成了城市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保护了城市总体文化个性”[28]。这种回迁或保留原住民的方式，有利于减少城市居民的城愁与乡愁，更增添了城市生活的文化趣味和真实的城市生活情景。

对于不得不搬离的城市居民“城愁”的纾解，需引导重建新社区归属感。所谓社区归属感，是指“社区成员对本地区有认同、喜爱和依恋的心理感觉”[29](P167)。较高程度的和较强凝聚力社区归属感，能够为居民提供一种除家庭之外的感情寄托的场所，有助于消除城市居民的孤独感和离群感。因此，要建立新的社区归属感，在搬迁上应尽量采取街坊邻里集中式转移居住，而不能过分实行分散化，这样可以让邻里关系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和延续，使得老街坊、老邻居依然能够在新社区中相见相知。这种旧有的邻里关系的维持是建立新的社区归属感的重要社会基础。同时，通过新的社区生活设施的建设，让搬迁居民能够尽可能地减少对新环境的不适应和陌生感。通过各种社区活动、社区交往和社区服务，提升搬迁后居民的公共生活氛围，帮助搬迁后的城市居民能够在新的社区中重建便利的生活方式和社群关系。

总之，“城愁”不仅是一种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时空场域的怀旧，也是一种迁移形态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依恋和不适应。要让城市居民记得住乡愁，就需要城市保留青山绿水，要有和谐的邻里关系。而要纾解搬迁居民的“城愁”，则需要重建他们新的社区归属感，并更好地重建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1] 叶君. 乡土·农村·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王光明. 从“望乡”到“望城”：香港城市诗歌的一个侧面[J]. 福建论坛，2001(5).

[4] 岳永逸. 城镇化的乡愁[J]. 民间文化论坛，2015(2).

[5] 周蜀秦. 城市的爱与哀愁：现代中国地级城市规划批判[J]. 现代城市研究，2006(1).

[6] 胡小武. 城市社会学：文化、空间与结构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7] 金丹元. 新中国电影美学史 1949—2009[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8]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 怀旧的未来[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9] 余之. 岁月留情[M].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

[10] 胡正凡，林玉莲. 环境心理学[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版社,2012.
[11] 张鸿雁. 侵入与接替: 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 [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12] Blake McKelvey. American urbanization [M]. Scott Foresman,1973.
[13] James C. Fraser. Beyond Gentrification: Mobilizing Communities and Claiming Space [J]. Urban Geography. 2007 (25).
[14] 黎熙元,等. 社区的转型与重构——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再整合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15] 水哥. 千年一梦 [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13.
[16] 半塘. 追忆老北京: 钟鼓楼广场拆迁引发怀旧潮 [N]. 中国文化报,2013 - 01 - 25.
[17] Henri Lefebvre, Rhythm Analysis [M]. Continuum, 2004.
[18] 董月玲. 冯骥才哭老街 [N]. 中国青年报,2001 - 09 - 26.
[19] 高春花. 列斐伏尔城市空间理论的哲学建构及其意义 [J]. 理论视野,2011(8).
[20] 田蔚风,李和兴. 都市文化与教育: 2006 上海研究生学术论坛主题论文集 [C]. 上海: 学林出版社,2007.
[21] 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22] Dietmar Jazbinse. The Metropolis and the Mental Life of Georg Simmel: On the History of an Antipathy [J].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2003(1).
[23] 田毅鹏. "单位共同体"的变迁与城市社区重建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24] 刘铁梁. 中国民俗文化志: 北京·宣武区卷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25] 梁梅. 中国当代城市环境设计的美学分析与批判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26] 周豫. 旧城改造如何留住城市的"乡愁" [J]. 公关世界,2014(4).
[27] 卢汉龙. 上海社会发展报告 2009: 深化社会体制改革 [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8] 熊向宁. 从城市社会学角度重构旧城改造的和谐对策 [J]. 规划师,2008(12).
[29] 王思斌.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第 6 辑 [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Urban Nostalgia and its Reac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

HU Xiao - wu

(*School of Soci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3, *China*)

Abstract: the migration in the urbanization produces homeland complex of nostalgia. Urbanization and urban modernization make great change of the urban inside social structure. Inner city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removal of old residents produce large number of urban inside emigrants. These emigrants have profound urban nostalgia because of the change of household, neighborhood, lifestyles and living environment. Urban nostalgia is the psychological result of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it must be seriously taken into account and relieved.

Key Words: Urban Modernization;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 Reproduction of Space; Urban Nostalgia

[责任编辑、校对: 冯金忠]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